

21 SHIJI BAOGAO WENXUE PAIHANGBANG




21世纪 报告文学 排行榜

周明 刘茵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1世纪 报告文学 排行榜

周明 刘茵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1世纪报告文学排行榜/周明,刘茵编.—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7
ISBN 978-7-80742-981-4

I. ①2… II. ①周… ②刘…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35850号

21世纪报告文学排行榜

周明 刘茵 主编

总策划 钟健华 周文
统 筹 朱法元
责任编辑 姚雪雪 王彦山
美术编辑 赵霞
封面设计 方方
制 作 马赞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4.5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981-4
定 价 38.0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0-5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 吕 雷 赵 洪 一位老人和一座城的传奇 / 1
- 陈启文 中国式总理 / 37
- 何建明 永远的红树林 / 64
- 李春雷 木棉花开 / 78
- 魏荣汉 昂贵的选票 (节选)
——“二百三十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 / 99
- 朱晓军 天使在作战 / 147
- 梅 洁 西部的倾诉
——中国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忧思录 / 180
- 一 合 红与黑
——一个“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 / 218
- 长 江 矿难如麻 / 271
- 朱 玉 天堂上的云朵
——回望北川 / 319

一个老人和一座城的传奇

吕雷 赵洪

一、深圳期待与邓小平一家延续亲情

2009年7月29日，邓小平同志夫人卓琳同志在京逝世，享年93岁。

《深圳特区报》发出消息称：噩耗传来，深圳人民无不感到万分悲痛。

深圳媒体报道：8月8日，深圳市领导专程赴京，“代表深圳市几套班子和全市人民沉痛悼念卓琳同志，深圳的同志远道而来，卓琳同志的子女邓朴方、邓林、邓楠、邓榕像接待亲人一样，给予了热情接待。”

与中央媒体发布的消息不同的是，深圳媒体强调邓家与这个城市特殊关系，表明了邓家与深圳的“亲情”。而且，深圳敬献的花圈摆放在显要位置，派出几套班子领导前往吊唁。

全国各地能以亲情示哀的，只有深圳一城。

消息特别提到：深圳市委书记告诉邓家子女，在深圳，无论是红岭路口的邓小平同志画像前，还是莲花山顶的邓小平同志塑像前，每天都有市民去瞻仰、缅怀，天天鲜花不断。而仙湖植物园里，小平同志、卓琳大姐一起种下的高山榕，已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深深扎根于深圳这块热土上。

深圳媒体的格式化官方语言掩饰不住的是这座城市与邓家那份特殊的亲情，如果理解当今深圳特区面对金融风暴的艰难突围和“特区不特”的困惑，就尤其懂得这份亲情的珍贵。

深圳人记得：在小平逝世十周年忌日，数十万鹏城百姓涌向莲花山小平塑像、红岭路小平画像及他当年两次南巡留下的处处值得纪念的地方，缅怀这位事实上总体设计、命名和“放生”过这座城市的伟人。是他赋予这座城市政治生命及生存权利。

“没有邓爷爷就没有我们的今天”，那一天，深圳中医院的老医生谢寿昌指着

小平塑像告诉自己怀里2岁多的小孙子。老人挤进人群，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位置，赶紧招手将自己的家人都叫过来拍照。“我们每年这一天都会来。感谢小平给我们带来幸福，感谢小平给深圳带来美好的今天，我们要永远纪念他，永远感恩。”

自毛泽东之后，没有哪个中国领导人能受到一座城市百姓如此长期膜拜，也没有一个城市市民群体对国家领导人的纪念有如此自发、集中与强烈的表达。他们把小平看做是为这座城市签发“出世纸”（准生证）的人，是长期呵护他们家园的守护神。

小平夫妇远行之后，这座城市上空曾经夺目的光环正被更多城市的光环所遮蔽，尽管深圳的官与民都期待着邓小平一家与她的亲情永久延续，但一个新的时代毕竟已经开始了。

二、深圳边界的景象曾经拷问过邓小平

当年，正当改革的先行者们在小心翼翼地试图突破禁区时，潮水般的百姓却出其不意地用脚板参与了一次“投票”。时至今日，仍没有人深入探究过这次大规模的百姓“投票”对特区的催生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边界禁区，两个海边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有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香港政府申报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一位72岁的深圳土著，说起这一幕时不胜唏嘘：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眼前，天空阔远，万籁俱寂。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条命作了这海湾的祭献。”当天，老人从派出所领到了750元葬尸费——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具是他的亲人。

“5.6”事件再次唤醒了人们对30年来100万民众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往香港的骇人记忆。

1949年10月19日，神速的南下解放大军挺进到罗湖桥头却戛然而止，深圳获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随后的30年里，深圳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越境“冲卡”群体事件。

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

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2万人。

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成功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小规模偷渡越境更无日无之。解放30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可以查证，但可以从人口数据对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当时的宝安县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总人口才312610人，10年增加了8081人，增长0.26%。宝安县志有记载，1956、1958年、1962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2年年末总人口下降到26.7万人，比1960年少4.7万人。解放30年，宝安县人口增加3.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0.48%，与全国同期增长率1.93%比，仅四分之一。一些老宝安说：宝安县人30年没有生小孩。沙头角镇的人说：这个有1000余户5000多人的乡镇，解放后向香港流动了累计有两个镇的人。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全县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中国改革实践第一人”袁庚回忆说，那时，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员就有400~500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这在当时也算是寻常事，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划回来的小船。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从1978年3月开始，万丰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伙一伙地泡在万丰鱼塘、石岩水库、求雨坛水库里苦练游泳技术，以备偷渡。当时，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万丰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风之机从陆上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由于劳动力大量流失，有9万亩土地被抛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灿灿的水稻烂在田里无人收割，附近的村庄里几乎难以见到15至35岁的青壮年。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

尸体。

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他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到广州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会面。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上述材料引自《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

有文章说：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其实，如果说外人听不懂这两句话还情有可原，但在广东，是个神志正常的人都听得懂，只不过没人敢明说罢了。然而在当时，只有邓小平才能面对深圳边界景象拷问，深刻领会到先贤孟子的那句名言：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叶剑英也在广州不断地对家乡人说：我们家乡总这样下去不行啊，要想想办法！

1978年，习仲勋刚到广东主政，在视察沙头角时，独自望着对面的香港长久沉思，同样接受拷问的习仲勋此刻不得不面对着活生生的资本主义的样板，不得不面对社会主义与对方令人难堪的对比，这种发展的反差是无法回避的，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绝不能如同鸵鸟一样将脑袋钻到沙子下装着看不见。

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河这边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港币；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人民币，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到几十倍（当时1元人民币可兑换3元港币）！

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来的。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14日，谷牧视察深圳时针对逃港现象说出了与邓小平意思一样的话：“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往我们这边来的多。我们大家共同

努力。”

谷牧意识到，边民往哪儿逃，取决于那儿有吸引力。对饥饿中的群众大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没有说服力的。正如邓小平说：“现在我们虽然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还没有资格大谈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小平在广州重新设计国是。他与叶帅都住在南湖风景区，叶帅则到小平住处，二人关门密谈。后来公布的史料才透露出来，小平此次到广州，是与叶帅等商议全党工作重心要转移的问题。他说：“文件要以什么为纲？什么才叫工作的纲？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现在提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肯定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提及。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深圳成为小平的试验田之前，当中国下一步如何走还没有定论之前，深圳已经起了一个全国其他城市不可能起的作用——告诉小平：再这样下去，不成。

据于光远回忆，在起草一次大会的重要发言时，小平提出一些地方可以先富起来，他说出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深圳。

到了1984年小平第一次南巡时，深圳农民与香港新界农民的生活反差的事，他还记得很清楚。因此他在深圳短暂的视察日程中，就有了深圳一个渔民村之行。

邓志彪是渔民村的第一任村长，人称彪叔。1984年1月24日，小平抵达深圳。彪叔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彪叔算是见过世面的农民，他并没有多想是哪位中央首长要来，作为全国首个万元户村，渔民村已经红遍了全国。

彪叔特地穿上了从香港买回来的一件款式很新潮的风衣。

他与村支书吴柏森两人立在村口等，10时许，一辆警车出现了，紧接在后面的是首尾相连的几台中巴车！领导人居然坐中巴？彪叔感到不可思议。当然，这个习惯后来也从北京传到了广州，广州的大官下去，也坐上了中巴。

更让彪叔惊讶不已的是，从第一辆中巴车里走下来的竟是邓小平。公社书记汤锦森，将彪叔拉到了小平面前说：“这是村长。”

不知怎么的，彪叔拉着小平的手，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对自己这种表现，很意外也难为情，但当时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小平问了他贵姓，听说也姓邓，然后很慈祥地笑了起来，彪叔这时才将眼泪止住。

渔民村曾经是逃港的重灾区，家乡办特区后，背井离乡的渔民们陆续返回家

乡，除了打鱼外，又搞起运输业与加工业，还开办了酒楼，到了1981年，全村户户收入过万元，成为广东第一批万元户村，村里还盖起了32幢两层的别墅楼。

小平一行人转了一圈后，来到了支书吴柏森的家，在吴柏森的小楼中，各种家电应有尽有，都是从境外进来的靓货。

吴柏森说的“广东普通话”，小平听不懂，于是市委领导充任闲谈的翻译。

吴柏森对小平说，现在日子过得不错，人均月收入有500元。

邓榕吃了一惊：“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要高！”

小平听了后特别高兴，主动拉着老支书要拍个合影。他感慨地说：“全国农民都要达到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吧？”

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把话接了过来，如同领军令状一般说：“不用那么长时间，我想有50年就可以。”

小平沉吟半晌没有说话，若有所思的样子，过了一阵他说：“至少也要70年呀，以本世纪末算，再加50年，因为我国人口多呀。”

在村支书与中央领导人比收入时，彪叔在一边吓得半句话不敢说。我们的收入比中央首长还高？这意味着什么呢？一股莫名的恐惧心理从脚底升起，“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事后彪叔这样形容。他当时担心这会成为一种错误，一种必须改正的错误。如果当时有领导人说这样不行，要改过来，村民不允许比中央领导人的收入还高，他们就会立即改。可小平没有“仇富”，反而很高兴。

小平问：“你们现在的生活改变了，还有什么要求吗？”

吴柏森想了想说：“要求倒是没有什么要求了，就是有点儿担心。”

“担心什么？”小平问。

“担心政策会变。”吴柏森说，“我们搞运动都搞怕了，现在虽然富了，但我们天天都怕政策会变，一变，我们就又变成资本家了。”

一席话使全场静了下来，吴柏森说出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声。小平也静了一阵没有说话。他此次到深圳来，下了决心只看不说的，有话要到北京去说。但他总是在每一个细节上碰到这种没有回旋余地的境地。

他面前这位是农民，他们要的不是对政绩的评价，是实实在在对今后好日子的期盼。小平想了想，采用了一种更含蓄与更深刻的回答：“政策肯定是会变的。但只会往好的方向变，不会往坏的方向变。”

从吴家出来后，小平又看了村文化室，看到村里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和许多奖杯呀奖状呀锦旗呀什么的，他显得特高兴，但是，小平只是听，只是笑着点头，再没有说话。

不说话，并不等于他不惦记着渔民村。8年之后，小平第二次南巡，当他视察皇岗口岸时，88岁的老人来到桥头，到了距深港分界线大约10米地方，小平

指着河水问：“这儿是不是深圳河？”

时任皇岗边检站站长的熊长根回答：“是的。”

小平又指着河边一片新楼说：“那么，这儿是什么地方？”

熊长根接着说：“这儿就是渔农村。”

小平说：“不对吧，渔民村不是在罗湖桥边吗？”

熊长根马上解释：“那儿是渔民村，这儿是渔农村。”

小平这才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三、深圳是小平过河时摸到的第一个石头

1977年7月16日到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恢复了邓小平的所有职务。

此时小平开始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思考变成行动，而这个行动的开端并不是在北京开始的。后来小平自己说：“我是到处点火。”

他点第一把火的地方，是广州。他到广州得到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深圳。

邓小平关注深圳，还有另一个大背景，这就是在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派代表团兵分几路进行考察。一个是港澳经贸考察组，另一个代表团便是以谷牧为团长的共和国第一个赴西欧的政府考察团。几乎是同期，还有一个由李一氓担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

考察团、组出发前，邓小平找谷牧谈话，他指示：好的、坏的都要看看，既要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了什么水平，也要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统一穿着中山装的考察团极其庄重地踏出国门，从5月初一直考察到6月上旬，人家对中国政府派出的访问团极其重视，谷牧他们到处享受了“红地毯”级隆重接待。

7月中旬，各路考察团、组先后都回到了北京，几份考察报告分别转呈了中央。这几个报告，在中央高层和元老中引起轰动，对于后来创办经济特区以及对外开放，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赴南斯拉夫的考察团的报告中提到：同样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这对小平发动改革开放和“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可能大有启发。

无独有偶，想在中国划出一块地方来“搞搞震”（广东话，搞点出格事之意）的人中，广东的领导人是第一批想吃螃蟹者。这个灵感起自胆大包天的吴南生，他想在老家汕头弄个类似出口加工区一样的名堂。

1979年2月28日下午，到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吴南生返回广州，当晚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就到了他家中。此前吴南生曾给他发了一个电报，电文中提到了这些想法，但语焉不详。习仲勋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他有更精彩的东西在肚子里没倒出来，故恨不得立即交心。果然，当晚两个人谈了很久，畅所欲言，在广东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3月3日，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吴南生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太困难了，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应该怎么办？既然三中全会决定解放思想，我提议广东应该先走一步。我是个喜欢下棋的人，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先走一步这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可以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儿来。

常委会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事来得太突然。只听吴南生又说：“如果省委同意，这事就交给我去办，我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搞出事了，杀头就杀我的头好了。”

吴南生以项上人头作抵押，充分估算了失败的代价，并且主动请缨当先锋，习仲勋挂帅就更淡定了，他说：“要搞，就全省一起搞（此话说得气冲牛斗），4月份中央要开工作会议，我们要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这就立即带来一个问题，向中央打报告，那么广东就要向中央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广东到底想搞一个什么名堂呢？这可把吴南生难住了。

吴南生他们将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贸易合作区”？总也不得要领。此时离进京时间越来越近了，习仲勋与吴南生就真的叫这个未出生的孩子的名字给憋住了，猛想起叶帅不正在广州休养吗？两个人遂径直去找他求援。听了两个人的汇报后，叶帅十分高兴：“好啊，这个事，你们不妨先直接向小平汇报，听听他的看法！”

小平办事就是不含糊。他听说广东要划个地方搞对外开放，居然为一个名字老定不下来为难，马上说：“就叫特区嘛，当年陕甘宁就是特区。”

小平一锤定音，正在孕育中的孩子有了名字。这个名字再次体现了小平务实的政治智慧。你在字义上没法给一个特区定性，它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进而言之，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字面上定不了性，但它又是与现行体制的既成框框不一样的特殊地区，要不怎么叫特区呢？定不了性不要紧，可以实现特殊政策就行，实际上就等于给特区开了绿灯。

尽管特区是小平提的，但北京当下就有了不同声音：陕甘宁那个特区，是政治特区，而广东的特区，不过是经济特区。

这倒提醒了习仲勋、吴南生：既然不是政治特区，那当然就是经济特区了。对，就用这个名字。如果说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经济特区这个委婉的提

法，就是足以抵抗非议的一块“大石头”——是邓小平为勇闯激流的改革开放先驱们摸到的第一块过河的“大石头”！

中央工作会议提到了改革，但如何改，并没有明晰的提法，直到会议闭幕，华国锋所作的闭幕词也没有提到广东、福建提出的开放问题，因为这两个省提出的问题，被打算作为特例，放在会后再处理。

会议中，习仲勋又向邓小平作出专题汇报，邓小平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就叫特区！”接着他又说了一番让人血脉贲张的名言：“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要特别注意这句话！这才是此段话的中心意思），杀出一条血路来！”

小平一锤定音，等于给深圳特区开出了“出世纸”（准生证），使广东、福建的形势在会议上发生了逆转，对外开放、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议题成了会上最热门的话题。

在北京参加会议的张汉青21日致电省委汇报说：“中央希望广东放手搞，要试办出口特区。划出一定地区作为侨胞与港澳同胞的投资场所。如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上海的崇明岛。外国厂商可以直接投资办厂，地方也可以与之办合资企业。”

小平要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此前中央决策加速四个现代化却遇到了资金不济外汇不足的瓶颈。而深圳声称不需国家外汇同样可以搞出口加工区，不向中央要钱，这可是相当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现在难以想象的是：小平当时就预料到在深圳这个地方会出现决定中国命运走向的争议，并且累及他88岁高龄还要再次到深圳去为其正名。

深圳前市委书记李灏认为：小平同志作为唯物主义者，他不能过早下结论，特区刚办了四五年时间，当然不能轻易说是成功的。但是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央试办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意思就是这个试验不能动摇。所以他当时说了这个话，特别是题了词，这是给深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题词。他针对当时的思潮，明确指出，办特区的决心不能动摇。没有小平拍板也不会建立特区，没有小平同志1984年那么坚定的话，我们特区早就收摊了，就不会有后面的实践和经验。

最后小平终于在上海感叹浦东开放晚了，事实证明上海再不开放必将落后，小平三次南巡大大加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小平第三次南巡时，在从深圳乘船前往珠海的途中曾打着手势对广东干部们说：不要挡，不要挡。充分说明老人敏锐地觉察到时代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

无数个深圳和变异的深圳被全国地方官们复制出来，现在深圳人觉得特区

不再特了，不是中央不再给他们独享的政策，而是比深圳还特区的地方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全国都特了，特区还能再特吗？

四、深圳既是小平的实验田，也是他的课堂

小平给深圳特区开出了“出世纸”，也在深圳学到了很多，哪怕是在匆匆忙忙的南巡工夫。很多回忆文章都提到他在深圳说了很多话，都是些石破天惊一锤定音的话。其实他更多的时候是看，只看不吱声，他是做过学徒工的人，多看多听、多问少说是他早年的看家本事。他很善于学习，观察敏锐，理解透彻，而且对事物的认识不先入为主。以他的阅历与资历，能如此虚心而诚恳地学习，在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领袖们中是十分罕见的。

1984年1月26日，小平第一次南巡到了蛇口，袁庚向他汇报时，小平来了兴趣。小平到深圳一直是只看不说话，到蛇口视察时他也不说话，只是听得很认真。但此时他要求到那个铝材加工厂去看看，“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小平说。

到了工厂后，他兴趣很浓，这里看一看，那里摸一摸。他摸着生产出来的铝材说：“很滑溜啊。”又凑到跟前仔细看铝材的包装上印的英文。他问：“这是要运到美国去的吗？”

袁庚说：“是的，这些全是要出口到美国的。”

小平此次在深圳，没有对他看到的任何事物发表评价，但仅在蛇口有一次例外，这就是当袁庚汇报到那两句著名的口号时他说：“对，很好。”

当时袁庚说：“我们蛇口，有两句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袁庚汇报时心里还直打鼓。有人对这两句口号很反感，说，蛇口搞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又是要钱又是要命的。但他还是将这两句口号做成大广告牌立在路边，而且在小平面前提到了这事。

小平的女儿邓榕脱口叫了出来：“我们在路上看到了！”

也许小平只看不说，她也有些着急，不过这一次小平简短而直接地肯定了这句口号。袁庚非常高兴，因为这两句口号引发的争论，不是如今我们能想象得到的。

小平也很高兴，尽管他还是把住嘴就是不出声，但兴奋之情已经溢于言表。到“海上世界”吃午餐的时候，小平便怂恿服务员给他倒茅台酒，倒一杯就喝一杯，一下子喝下去3杯，一边的邓榕见势头不对，就将他的杯子给夺了过去。

小平在深圳时就是不开口，深圳市领导们很着急，委托人暗示小平对深圳工作做些评价，但小平就是不开口：“我只看不说，现在不说，回北京再说。”

他回到北京后，召集了几个中央负责人谈深圳的情况，还谈到了扩大开放

的问题。小平提到了蛇口：“深圳发展得很快，蛇口发展得更快。为什么？因为给了他们一些权力，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当年国庆游行，上头通知蛇口也出一台彩车。这台经过天安门向小平致意的彩车，悬挂着这两句标语。它与北大学生打出的“小平您好”一样，成为当天最夺目的标语。而那两句标语的原件，1987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它确实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小平提到，“要学习借鉴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就是说是全人类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物质的精神的一切文明成果。学习要有一个课堂与实验室，深圳就起了这个作用。

小平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魄力启动了改革开放，但他一直对小国新加坡有着浓厚的兴趣，曾力主在苏州工业园复制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殊不知新加坡的李光耀对深圳一直长期观察并始终抱有信心。他认为中国如果把深圳的事情搞成了，一定能成大气候，因为中国领导人能从中探索到治国大策。

小平二次南巡时，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跟小平同志讲，李光耀对特区评价很多，有三句话是最重要的，第一句话：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它是改革的试验场、实验地。

第二句话：如果深圳实验成功了，就说明邓小平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是走得通的。李光耀说，我很注意你深圳这个特区，我每年都派人来调查研究，注意你这里的动向，你这个动向究竟怎么走、怎么做，你做的究竟会对国内外有什么影响？

李光耀的第三句话是：我当新加坡总理一二十年，我培养了很多百万富翁，但是我自己不能当百万富翁。

李光耀不愧为非常敏锐的政治家。小平认真地听取了李灏“传达”的李光耀的话，当时也没有吱声。但不久，他就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重要片段。

五、深圳由不得小平不争论

小平对习仲勋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后面加了一句杀出一条血路来，说明他对深圳的政治前景是有顾虑的。这在当时的背景下一点也不奇怪，否则吴南生请缨时也不会说要杀头就杀我好了。

但小平是希望在深圳搞建设，搞建设就不是搞斗争，他是希望不争论的，用小平的话说，允许试，允许看。毕竟是边陲一块小试验田而已。但党内就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不允许看，不允许试，他们对深圳持之以恒地攻击了十几年，几度险将深圳打入深渊。

这么一股子死缠烂打的劲头，不由得小平不争论。小平坚决捍卫深圳的政治生命，也缠斗了十几年，因此说小平与深圳的情分，算得上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小平争论方式独特：就是选择深圳做试验田，一心一意种出实践和经验的“粮食”，也做了失败失收的准备。他提倡不争论，其实就是少说多做不打嘴皮子仗，也为了争取时间集中精力种好试验田。

他第一次南巡之前，中央力主改革的主要领导人都到过深圳，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但并没有遏止住对深圳的非议。

人们对深圳创办初期受到的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无不耳熟能详：什么走私通道啦，租界啦，除了五星红旗什么都变了色啦，这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当时党内对改革开放是达成了共识的，深圳却成了是非之地。

最典型的是内地不少人认为深圳是靠进口外国货赚内地人的钱，靠输血过日子，针头一拔就死掉。那时中央一开会，各地方大员一方面猛要求在自己地盘上办特区，一方面埋怨深圳的特殊政策给内地带来了麻烦。大到各地银行企业争相到深圳去分一杯羹，造成肥水外流，小到内地人才以“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态度来个“东南飞”，这是对内地地方政府权威的直接挑战。

深圳以特区之特殊身份，很多事情绕过中央部委的审批自行其是，更直接挑战了部门利益与权威，此风一涨，国将不国，北京也就不再北京了。别人大事小事都要跑“部”前进，就你深圳一次又一次地到最高领导人那里告实权部门的状，这事叫“隔锅台上炕，蹬鼻子上脸”，是官场大忌，“婢”可忍“叔”也不可忍。

深圳在“条条”里不受待见，在“块块”内引发妒忌。省里有关“衙门”同样对深圳不忿，该放的权力就是不放，该开的绿灯就是不开，似乎这个大搞“特殊化”的特区举国无亲。

讨厌深圳的人未必就认为那里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攻击深圳的人一发难，袖手旁观者多，出手救援者却几乎没有，也就不奇怪了。为此大事小事都要劳烦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出面为深圳打圆场。

此时的深圳，算得上黑云压城，四面楚歌，里外不是人了。

1984年1月24日中午，邓小平的专列抵达深圳。稍事休息后，便听了市委书记、市长梁湘40分钟的汇报，他聚精会神，听到梁湘说深圳1982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6亿元，1983年跃上7.2亿元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是一年翻一番喽！梁湘连忙说：是翻了一番！比建设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增长了10倍。

邓小平听了，只是满意地微笑，并不开腔。梁湘汇报完后，请他作指示，邓小平指指脑袋：你说的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说着一挥手：到外面去看看去！

他登上了当时深圳“第一高楼”——国商大厦的22层平台。俯瞰大厦四周正在大兴土木的罗湖城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呈现在他面前。

没想到这座仅22层的楼房，给邓小平很深的印象，他回到北京，就提到了这次登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

只是他更没有想到，8年后他再次南巡时，根本就不可能再登这“第一高楼”了。当年他在22层天台看到周围的那些工地楼盘，已经迅速矗起，并将国商大厦埋进阴影里，当时著名的“第一高楼”天台变成了一个小“天井”。

当时小平由省长梁灵光、深圳市委书记梁湘陪同，登上国商大厦天台时，夕阳已经在天边发出散射光，寒气逼人。此刻的光线最合适看景象，因为斜射光更能呈现物象的立体感。

小平凝望着对面在建的一幢大楼，梁湘解释说：“深圳已经竣工与在建18层以上的高楼，已经有60多座。您现在看的这幢大楼叫做国贸大厦，要建成53层，它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我们采用先进的滑模技术施工，再加上工人都是没日没夜地干，3天就能建一层楼。”

小平笑了：“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他在天台上默默地站了二十来分钟，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但不久，3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传遍了全国。巧的是，到8年后的1992年春天，小平第二次来到这里，再次登临的就是他当年凝望过的国贸大厦。

现在不得而知的是，小平为何1984年第一次到深圳，也许他还想多看一阵子。多看一阵子更有把握性，说话的风险也小一些。但可能再不去深圳就不行了，他有些挺不住了。因此小平第一次来深圳，只听不说，小平听完汇报后没有讲话。这是对的，说出去的话是收不回来的，可见对深圳的事，小平非常严谨审慎。

但他回到广州后给深圳题了词，用李灏的话说：这就把特区“保”下来了，如果没有的话，期间可能特区就会夭折。

后来，很多回忆文章都众口一词地说小平是“斩钉截铁”地为深圳题了词，事实是小平在珠海很痛快地应梁广大在餐桌上的临时动议，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之前在深圳并没有也没打算题词。

深圳人情急之下，派要员追到广州珠海宾馆，再三请求小平为深圳题辞。但小平两次三番地婉拒：“到了北京再题吧”。

这不像是小平的性格。为什么？深圳太特殊，是是非非也太多，后来，深圳人只好赤膊上阵，通过各种关系，在小平下榻的房间里铺上了纸砚，再三请他题词。

小平思索了几天，最后提笔凝思，在洁白的宣纸上写了一句：“深圳的发